

義和團運動史討論文集

齊魯書社

K256.77/1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

齐鲁书社编辑部编

DE0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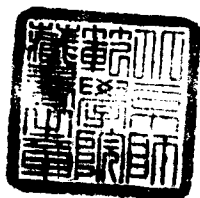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5698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885698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齐鲁书社编辑部编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25印张 461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11206·42 定价 2.25元

前 言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它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唤起了人民的新觉醒，是半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取得胜利的奠基石。八十年来国内外历史学者对义和团运动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特别是建国以后，我国历史学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对这一段历史的新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学术研究受到挫折，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也走上歧途，陷于混乱。

粉碎“四人帮”后，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整个学术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活跃气氛，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也不断地提出来探讨。为了适应这项学术研究的需要，山东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吉林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等五个单位，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共同发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和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友好国家的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向大会提出的论文包括国外学者的论文共计一百余篇。

为了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们委托山东大学历史系徐绪典、路遥两位同志主持，并由山东大学历史系

傅友休同志承担了一些具体工作，编辑了这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因篇幅所限，会议论文未能全部收入。所选篇目由我社最后确定。选编工作可能存在着缺点，请读者指正。

齐鲁书社编辑部

1981年8月8日

目 录

前 言

批判极左思潮，推动研究工作	戴 逸 (1)
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丁名楠 (6)
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法的几点意见	李 侃 (20)
义和拳和白莲教的关系	金冲及 (27)
汇报义和团运动的资料编辑工作和一点意见	荣孟源 (34)

乾、嘉朝义和拳浅探

——义和团源流论证侧记	程 献 (41)
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	路 遥 (65)
义和团源流刍议	徐绪典 (98)
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戚其章 (118)
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	林华国 (139)
论义和团运动的特点	廖一中 (161)
试论义和团的几个问题	林树惠 (176)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 (185)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	朱东安 张海鹏 刘建一 (207)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宗教迷信?	李吉奎 (230)
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说明了什么?	陈振江 (241)
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	吴思鸥 (255)

“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

- 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张 力 (277)
- 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林敦奎 李文海 (294)
- 试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光绪 孙孝恩 (315)
-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对外“宣战” 金家瑞 (332)
- 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华
的矛盾和斗争 胡 滨 (358)
- 义和团时期帝国主义在联合侵华中
的矛盾和斗争 李德征 (374)
- 十九世纪末山东的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 孔令仁 (402)
- 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
笔偶存》述略 朱全甫 庄建平 (432)
- 义和团在山东活动情况二、三事 张寄谦 (453)
-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王守中 (462)
- 毓贤与山东义和团 李宏生 (483)

《义和团源流》考

- 义和拳、八卦教 [日本]佐藤公彦 (500)
- 山东的基督教、白莲教与义和团
三者关系的一个新解释 [美国]包德威 (524)
- 义和团的起源 [美国]舒 雯 (551)
- 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 [美国]周锡瑞 (576)
- 义和团的运动、思想与宗教 [日本]小林一美 (597)

批判极左思潮，推动研究工作

戴 逸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在十年浩劫期间颇为时兴了一阵，四人帮居然也大谈义和团。当然，他们不是科学地研究和正确地评价义和团，而是为了煽动红卫兵“造反”，胡乱吹捧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方面，把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歪曲得面目全非。四人帮被粉碎了，思想得到了解放，理所当然地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所以，近年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这些文章在拨乱反正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当然，有的文章，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时，某些论点强调得过了头，可能把农民的缺点，说得太多太重，这完全可以商榷讨论。我们和四人帮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自封为绝对正确，搞一言堂，只准许发表一种意见，而我们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学术上的各个派别，各种观点，只有各抒己见，展开充分的讨论，才能够分清是非，促使科学的发展。这次义和团运动讨论会上摆出了很多不同观点，意见的对立甚至很尖锐，如：义和团的起源问题，义和团反不反封建，扶清灭洋的口号、盲目排外问题、义和团的历史作用等等，争论很热烈。科学研究中出现许多不同意见，这是好事情，是科学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标志，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经过几天讨论就做出结论。在这里，不能要求“舆论一律”，不同意见的存在正好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钻研问题。

现在，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学术空气很活跃，出版了许多刊物，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各个领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简直是“目不暇接”。学术争论很广泛，也很尖锐。就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来说，上自太平天国、中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下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很多新观点。我感到：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中，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思想活跃。有不少从前认为有了结论的，也提出了怀疑；有不少一向以为天经地义的，也产生了问题。这种局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科学就是要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而不囿于成说。凡是在科学上提出新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当然，这种新观点最后能否成立，那是需要经过讨论，经过检验的。

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存在着广泛、深入而又尖锐的学术争论，这是怎么发生的？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学术争论是以特殊的形式，对我们三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绩的一次回顾和检查。十年浩劫，使我们增长了智慧，学习了不少东西，感到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各条战线都在回顾我们过去的三十年，哲学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当然，并没有人在号召和组织我们去回顾和检查过去，可是，对事业的责任感，希望历史科学能更好地发展，这是无声的命令，迫使我们不得不回顾三十年走过的里程。对于这次义和团讨论会，对于会上出现的尖锐的意见分歧，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的意义的。讨论会上的意见分歧，实质上产生于我们对三十年研究成绩的回顾和检查。过去哪些论点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哪些论点是错误的，应该抛弃？哪些论点有缺陷，应该补充修正？在这些方面，我们有意见分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没有这些争论，也不可能发生这些争论。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变化了，才有这些争论。学

术领域中，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回顾和检查过去的研究成果，这种讨论应该继续开展下去，以利于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具体到中国近代史或者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绩很大，有其光辉的、值得自豪的一面，我们应珍惜、爱护已取得的成绩，这是没有问题的，回顾和检查过去并不是全盘否定过去的成绩。但我们的历史研究确实也有并不美妙的一面，经历了挫折，走了弯路，干了蠢事，我所指的是三十年来左倾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我并不是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射史学和批儒评法那一套。对于那一套的错误，大家现在都已认识到了，我是指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在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对历史学的干扰，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可能不是那样清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在历史学阵地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时刮起一阵阵左倾的风，吹得我们晕头转向，立脚不稳，受到很大干扰，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十年浩劫，对于不了解其原因的人来说是突然发生的，偶然的灾难，正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但如果研究一下解放以后十七年的政治状况、思想状况，那末，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又不是突然的、无缘无故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早已存在的那股极左思潮的恶性发展。

历史学不是在真空中生长的，必然受到影响。甚至，解放初期，全国范围内“左”的思想尚不严重的时候，历史学领域就刮进了一点“左”的风，当时，对电影《清宫秘史》展开了批判，这是一场冤案、错案，现已平反。这可以说是“左”倾思想的较早的表现，直接影响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清宫秘史》的一大罪状就是诬蔑了义和团运动，当然电影有缺点，对农民的弱点夸大渲染过甚，这是不对的，可以批评、讨论，但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电影中的一些问题，方法是错误的，影响

是不好的，至少使人不敢去仔细地研究义和团的落后方面。这次讨论会上，大家都承认过去研究中对义和团的局限性研究得不够，轻描淡写。如果这是义和团研究中的缺点的话，那末，我想，这个缺点之所以产生恐怕和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是有关的。

接着是批判电影《武训传》，再下去是《红楼梦》的讨论，反右派斗争，拔白旗，史学革命，反右倾，教学检查，反修正主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对历史科学有过多次冲击。许多事情，记忆犹新。如农民战争的讨论，本来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有的同志对农民的落后性多讲了几句，就成了政治罪名，遭到打击批判，在坐的有的同志身受其害，当时关锋一伙打棍子最起劲。后来，到了批判李秀成、批判《海瑞罢官》，十年浩劫首先在历史学领域中打开缺口，拿历史学家开刀祭旗。

回顾和检查过去，应当肯定我们取得的成绩，但也要承认产生的问题。文学中有所谓“伤痕文学”，应该坦率地承认历史学身上也是有“伤痕”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因此而躺倒在地，哭哭啼啼，灰心丧气，不思振作，而是应该治愈“伤痕”，肃清流毒，恢复健康的机体，大踏步前进。我们在十七年形成的许多观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确有回顾和检查的必要，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现在，不是要不要回顾和检查过去的三十年，而是已经在回顾和检查了。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争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深刻和尖锐，我认为这就是回顾和检查的结果。过去三十年，有一股左倾思潮经常侵袭着学术界，今天，我们不得不对以往取得的成果、形成的看法，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把义和团研究中出现许多尖锐的意见分歧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不知道是否恰当。

对于会议上出现的分歧意见，我在倾听和琢磨双方的论

据，来不及表明我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应该说明：回顾和检查过去是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应该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来分辨是非，而并不是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来纠正所谓历史学领域中“左”的偏差，如果这样搞，就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左”和“右”是政治概念，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不是“左”和“右”所能概括的。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运用马列主义熟练的程度不同，都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这是学术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学术分歧并不排斥政治上的一致，我们可以在学术上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可以是亲密的同志。

学术界极左思想的影响必须肃清，可是不能够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能把某种学术观点随意地加上“左”或“右”的帽子，这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不利于讨论，不利于团结。我们要学会倾听和尊重不同意见，习惯于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养成一种既严肃认真、又谦虚谨慎的好学风。

尽管存在着广泛而尖锐的意见分歧，但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的指导，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我们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丁 名 楠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曾经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今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中外历史学者在济南集会，济济一堂，对义和团运动史进行学术讨论，很有意义。近几十年来，历史工作者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说明人们对这次运动是重视的。从目前史学界的情况看，义和团运动的重大问题如源流、性质、口号、历史作用等等，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分歧还很大。义和团运动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它只有通过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摆事实，讲道理，采取百家争鸣的方式，来求得看法上的一致或者基本一致，其他办法是不可取的。而且，作为学术问题，即使长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也是允许的。

我对义和团运动没有多少研究，现仅就其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意见。

一、义和拳的源流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粗粗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或者三种说法：一、乡团说或者团练说，二、秘密结社说。后者又可分为一般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或教门说两种。我认为义和拳不是教门，更不是团练，而是一般秘密结社。义和团的前身

义和拳同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有渊源上的关系，其特点是练习拳术和持符念咒，降神附体。义和拳这个名字，最早见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实录，称它为“义和邪教”，也就是说教门。但它不是教门，理由是：一、它没有教主，不象白莲教那样奉弥勒佛为教主。义和拳信多神，多得简直难以数计，《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武侠小说、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某些历史人物都是信奉的对象；二、它没有经卷。教门一般有经卷，如清茶门教有《三教应劫总观道书》一类经卷。清政府破获义和拳个别组织时，宣称获有“妖书”，但看来不是经卷；三、它没有天理会“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一类八字真诀。1899年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撰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文，说它是白莲教支流，是“邪教”、“教门”，显然是故甚其辞。清政府历来严禁传习“邪教”，违者按叛逆治罪。劳乃宣援引嘉庆十三年（1808）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用以证明义和拳是邪教、教门，不仅反洋教，而且是叛逆，其目的在希图说服清政府用对付“邪教”那样来镇压义和拳。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都翻刻这篇文章，广为传播，使之家喻户晓，用来作为大力镇压义和拳的依据，由此劳乃宣的教门说后来成为许多人立论的根据，但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乡团说或者团练说最早出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而且他第一个用了“义和团”这个名称。他报告清政府说，义和拳是梅花拳的别称，直鲁毗连地区人民有练拳的习惯。它创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是民间团体，目的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并非故与洋教为难”。他还建议私会官练，“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1〕}这个奏折同他上个月（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的报告自相矛盾。那份报告说，直隶山东交界“有新立义民会名目”，“欲与洋教为难”，正严饬

地方官防范弹压云云^{〔2〕}。张汝梅跟臬司毓贤商议后，接着又发出这个奏折，强调义和拳创设于咸同年间，无非是说，第一、义和拳不是反教组织，因为创设时山东还没有教堂，第二、当时各省奉命办团，用以对抗太平军、捻军等反清势力，暗示它是乡团一类组织。张汝梅的奏折意在替义和拳掩饰，免得清政府进一步查究，是很清楚的。美国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一书，说义和团“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秘密的组织，而是一个合法的忠诚（于政府）的团练”^{〔3〕}，是没有多少可靠的根据的。台湾出版的戴玄之《义和团研究》一书，说义和团是团练，“是由梅花拳演变而来，梅花拳是由义和拳演变而来”。“拳变时期的义和团，是由光绪十三年由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演变而来。”^{〔4〕}他的主要依据是张汝梅的奏折。这份奏折本身既然有问题，该书所持的团练说自然更不可信。

义和拳的源流对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关。团练是清朝腐朽统治的一种支持力量，而秘密结社历来受清政府的查禁，是它的对立物。我认为它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研究义和拳的起源是件困难事。第一、乾嘉时期的文献记载很混乱，嘉庆以后到甲午战争七八十年间，记述义和拳的文字资料几乎完全缺如；第二、局外人难以知道内情，不是秘密组织的成员很不容易了解到它的内部奥秘。二十年前山东和其他地方的同志曾作过实地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健在的参加义和团的老人，其中有些调查记录今天成了可贵的材料。近来有同志利用文献资料，结合调查记录进行研究，对义和拳的来源问题，取得一些进展。但要搞清楚这个难题，还需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二、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这是个与评价义和团运动直接有关的问题，看来意见分歧也很大。费纳克说：义和团“从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他们就得到朝廷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各省的官员中也得到支持，但直到开始围攻各国使馆时，朝廷才最后公开地支持义和团。”〔5〕订立《辛丑和约》时，各国代表要清政府承认支持义和团的错误，要它向帝国主义国家赔罪道歉。难道清政府真的支持了义和团反帝斗争吗？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同列强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来，它承担了替它们维持秩序包括保护洋教的义务，当上了奴隶总管。群众在各地此伏彼起的反教斗争经常冲击外国侵略势力，清政府因此多次受到帝国主义的责难，从而影响中外反动派的关系。但长期来清政府总是极力镇压反教群众，尽量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在成都教案、巨野教案发生后，它甚至不惜把川督刘秉璋、鲁抚李秉衡革职。义和团运动前，清政府更加成了它们的奴仆，更不可能支持群众反教。清政府一开始就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而事实也否定了这个说法。直隶、山东两省督抚镇压义和团的活动，是根据清政府的旨意行事的。直隶总督衙门一名官员抄录的《直东剿匪电存》就是证据〔6〕，它保存了裕禄与张汝梅、毓贤等人关于镇压义和团的往来电文。至于两省当局在执行清政府的命令方面，态度上确有不同。张汝梅、毓贤都认为山东群众与教民冲突，教会应负完全责任。但他们是地方官，不能违抗朝廷旨意，顶多用义和拳是乡团一类说法加以掩饰。冠县义和拳首领之一姚洛奇是被张汝梅剿灭的，平原、茌平一带活动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是由毓贤捕杀的。这难道不是事实

吗？裕录一直积极镇压义和团，直到1900年6月15日，即大沽炮台被夺占前两天还奏请清政府“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7〕。大沽开战后，他也认为不能既镇压义和团、又抵抗外兵，同时两面作战，才请求清政府准其“从权招抚”〔8〕。正因为裕录一直积极镇压义和团，英国政府在战争打响后，通知在华英军，如果裕录要求避难，英国军队应予接待并加以保护。至于袁世凯，由于他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御史言官强烈反对他，甚至要求将他免职。在当时情势下，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规模屠杀义和团，而是根据清政府“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指示，把各处义和团重要首领王立言、玉文义等加以捕杀，以致后来义和团在直隶的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山东相对说来却显得冷冷清清。因此，清政府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样，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统治力量更加虚弱。在建储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疑神疑鬼地猜忌它们会用武力拥立光绪帝。在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的关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镇压，尤其不得人心。一些御史言官甚至一再奏陈西太后，抑民扶教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指出义和团虽然闹事，但毕竟是中国老百姓，教民心向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为“洋民”〔9〕。清政府的镇压政策，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左右摇摆，对义和团的镇压时松时紧，不能始终地贯彻执行。这对义和团的发展极为有利。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也有助于义和团的加速发展。但是清政府即使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也不至于弄到依靠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宣战。开战后不久清政府要驻外使节向所在国政府解释的电令，说了真话，它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10〕。但在六月中，它确是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这又怎样解释呢？应